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23)

写小说的手艺人

□金理

哲贵,本名黄哲贵,生于1973年,浙江温州人。出版有长篇小说《迷路》、中短篇小说集《金属心》、中篇小说集《信河街传奇》。代表作有小说《金属心》《责任人》《空心人》《住酒店的人》《施耐德的一日三餐》等。曾获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

哲贵游过一次寺庙,看他合掌顶礼的姿势,想来就不是俗人。后来才知道,好多年前他曾在玉苍山下一座草庵里有过出世修行的经历。对他来说,这大概是一个“断裂”的时刻,此后,哲贵人生态度的方方面面,也许皆能见出悟性。

从“这一天”开始

这一天,从朋友的追悼会回来,黄徒手“决定把事情做个了结”(《责任人》);这一天,“唐小河觉得董娜丽把他身体里的某种东西叫醒了”(《雕塑》);这一天,麻妮娅“想出去走一走”,这个念头突如其来,似乎是向未婚夫赌气,同时也想透透气,因为“她觉得好像被一个无形的铁圈箍住”(《迷路》)……

哲贵的小说,大多会从“这一天”——一个日常生活的“断裂”时刻——开始叙述。一般的故事,在结尾都会走向“圆满”,或者说,用“闭合”的期待来克服“断裂”;尽管习以为常的生活图景突然暴露出不和谐,但最终危机得到化解。这样的“闭合”依然维护甚至固化了原先的结构。但是哲贵的设计不是这样的,“这一天”之后,再也不是回到原先的轨道,而是裂解出新的可能性,另外一种生活的意义出现了……比如《迷路》中的麻妮娅,在白云尖整整待了35天,搜寻失踪的雷蒙,其实更重要的是“搜寻自己”,完成自我心灵的洗涤;当麻妮娅下山之后,不再会是原来的那个“我”了,这就不像夏孝阳,还会回到原先的“程序”里,“过他的程序生活”。

哲贵小说中的“断裂”时刻,对于主人公来说,往往意味着不适、不满足,在习以为常中感觉到了格格不入,甚至萦绕着一种关于过往生活的失败感。不过,正是产生了对于失败的自觉,人才能够意识到转变、意识到生活的“未完成”与“再次生长”,才能在大多数人“向钱跑,也一直向前跑的时代”里,停下脚步,自我审视,这当然得付出勇气和代价,但也是必须的,必须在自己“这一天”的时刻,停顿、内省、重新开始……

成功人士的“另外半张脸”

哲贵几乎所有小说都在描述信河街和这条街周边的人。信河街是一个民营企业特别发达的地方,据工商部门统计,有10万家中型企业,个体户有35万家,主要从事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等行业。信河街90%以上的人都是在做生意。哲贵专心描绘的就是这一特殊人群,在飞速的经济发展中积聚起财富,他们被称作“成功人士”。经济发展在今天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成功人士正是时代的英雄,就像最近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所表达的主题:向成功人士致敬。但正如王晓明先生的洞识所见,在一般的广告、传媒与文学书中,我们看到的只是由饮食生活、休闲方式、商务应酬等所构成的“半张脸的肖像”,这成功人士迷人的“半张脸”,成为公众艳羡和追慕的符号。与此同时,另外的“半张脸”则被悄然隐去了。

哲贵小说的新意正在于此,他带领我们去勘察成功人士那“另外半张脸”,当我们掀起神秘的面纱时,赫然发现种种病象。《责任人》几乎就是一篇病象报告:黄徒手每天晚上加班制作镍片,“身上的各个口袋都塞满了钞票”,在事业开始发达之际,身心却出现“异变”,外部症状是失眠、头痛、消化不良、情绪低落,更要命的是总被一股酸酸的镍片气味所围绕,挥之不去。镍片本是黄徒手发家致富的杠杆,现在却成了一击致命的“病源”。

刘可特的症状更诡异,他必须听厂里女工讲述一个个故事才能安心。刘可特曾经因为拉拢大客户而导致一家公司被收购,“随着他的生意越做越好,脑子里总是浮现出来原来那个公司的模样,公司里每个人的脸都会从他的

在马斯洛的心理学中,人的需求区分为多种层次,生理等需要之外,人还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其实,欲望也有多个面向,在欲望叙述中我们往往忽视的是人的生命欲望的表达,而实际上,外在刺激下的欲望往往伴随着人生命内在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欲望交互唤醒、激荡。黄徒手辞职出来单干,凭着“在电泵厂里施展不出来”的一身手艺,他打出了气阀、跳板、点火装置等各种各样的配件,此时,“黄徒手眼睛红起来了,跃跃欲试”……这不仅是追求更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萌动的,还有对他个人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满足,显然,生命欲望与活力、创造力紧密相连。哲贵笔下以黄徒手为代表的这批人物,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试水者”,他们凭借着手艺、胆识与勤奋,开创出自己的事业,这个时候欲望的因素往往伴随着个人独立、自觉与解放的主题。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社会每一个角落,资本、商品、股市、房地产、投机事业等自由经济因素迅速改变了社会和人的面貌。在一个人欲横流的年代里,欲望的追寻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还是黄徒手,事业开始蒸蒸日上,闻着每日赚进的钞票里那股特有的,甜甜滑滑的味道时,“他还闻到了手中镍片发出的一股刺鼻的酸味”。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生活在与他者构成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的欲望当然不可能孤立存在,自我欲望的满足往往就会与他人欲望的满足发生摩擦、碰撞与冲突,“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所以孔子才会提出仁者“爱人”的哲学,辜鸿铭的解释是:“人类社会的所有关系之中,除了利害这种基本动机外,还有一种更为高尚的动机影响着人们

的行为与选择,这就是责任。”(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哲贵把自己的一篇小说取名为《责任人》,主人公黄徒手在治愈自己心病的过程中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所有的付出,就是不想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而王文龙九死一生返回信河街还清贷款,为的也是担当起“责任”(《信河街》)。“责任”是对物欲、生命欲望等内外欲望的升华与调节,这不完全是外在的规范,毋宁是出于主体的自觉与内心意愿,不妨说,这是一种“精神欲望”。在《迷路》的最后,大草坪上搭起20多个帐篷,“每个帐篷里射出一团团的柔光”。人们抱着同样的目的上山,“谁不知道白云尖的险峻?谁不知道白云尖危险?现在大家都来了,都已经把个人安危放在一边,谁能出面阻止大家这种发自内心的行为呢?”那“一团团的柔光”正象征着“精神欲望”的觉醒与集结。

天工开物,技近乎道

在打火机限流片上如何打出6微米的小孔(《责任人》);山林里迷路时如何辨别方向,往泥土地方还是石头多的地方走,而例外情况是什么(《迷路》);工厂要造抽水马桶,唐小河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从内壁坡度到冲孔大小整个构造(《雕塑》);黄伏特开餐馆,悉心掌握各种选料知识:“东海的黄鱼在每年的七八月份最好,因为过了这个季节,它们就要过冬了,在过冬前,要把身体养肥”,“鸽子要选落地鸽,刚出生八到十五天的鸽子,肋骨和头盖骨都是软的”(《牛腩面》)……穷形尽相地写技艺、写各行各业的知识,这是哲贵小说非常突出的特征。他乐此不疲,也许正是为了追求王安忆经常强调的“经验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小说是由经验、材料、细节构成的,物质外壳如果失真,整个小说大厦的逻辑性和可靠度就摇摇欲坠。

我猜测哲贵的用心不只于此。《跑路》中曾经描写过胡卫东的手:“那是一双粗壮厚实的手,也是一双布满老茧的手,那是他长期做皮鞋的结果。”你能够想象:曾经在刺鼻的作坊里,通过无数道量脚、批皮、打胶、合针等工序,在这双手上所诞生的皮鞋肯定如海量般难以计数。这是哲贵笔下这群成功人士的特殊性:他们的父辈都是兢兢业业的工匠、手艺人,他们自身亲历了从传统作坊转向现代工厂的打拼,不是今天坐享其成的“富二代”,也不完全是依靠雇佣劳动的“资本家”,他们一直不脱离甚至热爱着具体的劳动过程。《牛腩面》中的黄伏特,每天辛苦出入于菜场、庖厨间,他觉得在自己的行业里“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这多少有点“技近乎道”的意思了,往前追溯恐怕就是《庄子》里那些手工匠人,潜心于物,通过具体的劳作而上窥那潜隐于万象中的“道”。

手艺是切身的,天天上手,内在于日常生活,是一个人与世界最基本的打交道方式。同时,也借此方式得到自身应对命运的、不息流转的力量;也就是说,那“道”也会通过具体的劳作而往返、护持匠人的生命。黄徒手克服身心危机的关键之一,正在于回复手艺人的本色,用镍片亲手配制出一副眼镜,“拿出全身的本事,也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就像当年设计限流片的小冲床一样,一点点地把这副眼镜做出来了”,如其所言,这个制作眼镜的过程,“也就是给我自己治病”。这大概就是胡兰成说的“一器亦有人世之思”(胡兰成:《中国的礼乐风景》);也是沈从文说的:小木匠作手艺,“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

对于哲贵来说,写作是多年的坚持与热爱,但也不算他的“正业”;在工作之余下笔,产量不高,质量却稳定,发而皆中节。我特别信服这种态度:慢工出细活,也像他笔下的手艺人,及物而不执于物。

■创作谈

想来真是悲观,触动我写小说的动机,往往是社会上的阴暗面,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上发生的不良事件更容易引发我思考和表达的欲望。《金属心》《责任人》《跑路》《住酒店的人》《施耐德的一日三餐》等小说,几乎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譬如,写中篇小说《信河街》时,我所在的城市正面临着一场民间借贷危机——有人通过民间借贷的手段,敛聚了大量资金,然后携款潜逃。这可能是一场资金的危机,也是一场信用危机,更是人如何践行契约的危机。我们都面临着这个危机的考验。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猜疑和不信任的环境里,因为当下的社会,经济被提升到一个绝对高度。物被无限放大,信仰和坚守被忽略,甚至变成一桩可笑的事情。这个世界似乎倒调过来了。

以前不是这样的。我所生活的城市,据说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民间借贷,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一对一的借贷,譬如你借我一万元,约定借款期限是半年,这半年里,我每月还你利息,半年一到,我把本金一次还清;还有一种是组织互助会,一般是10个人,由一个会首牵头,可以是一个月收取一次会钱,也可以是三个月或者半年,10个会员轮流收取钱,越到后面的人,出的会资按一定比例减少,互助会是亲戚和朋友之间比较普遍的借贷形式,有互相帮忙的意思。我问过父亲及父亲的上辈人,他们或多或少都参与过这种民间借贷,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在这种经济活动中违反规则,他们说:都是亲戚朋友,如果在这种事情上动歪念头,以后怎么做人啊?

说得太好了。做一个“人”,是父辈们最基本、最朴素的信念。但是,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这个信念都丢掉了呢?

在我的记忆里,最早出问题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抬会现象,很多会首卷走会钱逃匿。第二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所在的城市出现了“白银背”现象——很多人卷走白银出逃。第三次就是现在,出现了大量的民间借贷,而且基本是高利贷。这段时间以来,我不时听到社会上传来某人逃跑的消息。

现在问题出来了:作为一个写作者,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样的问题,你怎么想?又如何在纸上发出你的声音?

是的,首先是发出声音。我觉得,写作作为一种古老的表达方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有责任对当下的社会发出属于他的声音。这种声音可以是尖利的,也可以是混沌的;可以是阴冷的,也可以是温暖的;可以是快速的,也可以是缓慢的,可以是嘹亮的,也可以是低沉的。惟一的要求是声音的独特性。其次是如何发出声音,即声音的表达方式,除了必须遵循的基本艺术规律,每个写作者都要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借用传统手艺人的说法就是要“绝活”,只有这样,才能发出庞杂而丰厚的声音。

当然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既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主观的认识,却又不能对世界有一个预判,不能对人和事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觉得,只有对所处的时代进行不带偏见的观察后,发出的声音才有说服力。我的所有写作都碰到这个问题,我描写的是一个商人群体,他们已经或者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所谓的成功者,当他们遇到并卷进各种各样的问题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表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商人的唯利是图,任何付出都讲究回报。这是事实。这种事实也造成了公众对当下商人群体的预判——所谓商人,就是一群暴发户,他们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内心一片荒芜。

这种预判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可是,这种预判也是一种极端的偏见和遮蔽,把世界分成了非黑即白的两极。对人进行粗暴的归类,即官员是什么样的,商人是什么样的,文人是什么样的,医师是什么样的,农民是什么样的,工人是什么样的。于是,世界在这种预判之下便条理清晰起来,一切都是掌控之中。

可是,这种预判恰恰遗漏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忘记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是何身份,他(她)首先是一个“人”。(他)同时拥有简单和复杂,温暖和冷酷,善良和险恶,人性和魔性。

这些年来,我看到太多带有明显偏见的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已进入文学殿堂,成为经典,可对“人”的描写,特别是对商人群体的描写和塑造,带有明显的偏见,这是不公平的,更是失职的。所以,我就想,在在这个问题上,我能不能做点什么?能不能发出一点声音?我能不能做到不带偏见地进入商人的内心世界,把他们当作一个“人”,描写他们的彷徨和挣扎,欢乐与忧愁、淡定与恐慌、勇敢与懦弱、责任与逃避,得与失、哭与笑,雕刻出他们真实的形象?

再以《信河街》为例,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首先,那场民间借贷危机深深刺痛了我,我的许多朋友都卷进这场漩涡,浪迹天涯。从某种角度说,他们也是这次危机的受害者。其次,这场危机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更让我警惕,一个社会,如果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秩序的运转能正常吗?如果人与人之间连正常的信任都已失去,还能称之为“人”吗?

从这个角度说,我宁愿相信,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三次问题的出现,只是历史进程中的某一次颤动,是暂时性的失衡,人性也在这种失衡下表现出黑暗的一面。既然有黑暗的一面,必定有光明的一面,我坚信人性中美好的存在,希望尽量真实地描写笔下的社会和人物,发出哪怕是最微弱的一点声音。

在纸上立得住的人物,各有其声口,各有其情状,组成了这个时代的清明上河图式的人物画卷。

杨小凡喜欢运用富有余韵的侧面描写或闲笔,这使他的小说即使涉及严肃的主题,也是那么隽永润泽、举重若轻。他擅长避实就虚,人们早已熟悉的、新闻里司空见惯的场景、人物,就不过多浪费笔墨,他的重点是写虚,这虚,实质是无处不在、弥漫的内在的魂。比如,他避开惨烈的强拆场面,更多着墨于即将失所的七奶奶和小燕子的生死依恋;手握重金的银行行长痴迷斗蟋蟀,和养蟋蟀的老汉结为挚友,一个内心厌恶官场商场,渴望自由自在而又无可奈何的人物跃然纸上。这样便写出了真性情,不再拘于道德评价,让《楼市》这部画卷的众多人物摆脱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恢复了人性的幽微、复杂、丰富。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像市委书记朱玉墨、市长冯兴国、站在拆迁第一线的村书记水亮、地产商胥梅、售楼经理蓝雪,都不是可以一眼望到底的简单人物。

杨小凡的《楼市》,写得真诚,读得不累,作家的思想、体验、担当,都融化在其中活着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里,你仿佛可以从中随意唤出几个人物,和他们扯扯闲篇,问问楼市。

■短评

《楼市》:写得真诚 读得不累

□谢欣

杨小凡的长篇小说《楼市》是一部有广度和深度的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房地产行业牵一发动全身,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既是经济焦点,又是整个社会的放大镜。此前也有不少房地产小说,但都以地产商为轴心,写他们和政府官员的交往、和商界同行的争斗,格局不够大。《楼市》把房地产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全景式地展现中国高层与底层、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买房人与被拆房人,是以楼市为切入点的当代中国画卷。

我很佩服杨小凡的勇气。房地产行业是各方利益、各种矛盾的集散地,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不必要的毁誉,但作家没有回避这些。小说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处于社会上层的强势者: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销售商、银行;另一条是处于底层的民间百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像无力阻止老屋被拆的七奶奶、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揣着血汗钱的买房人。小说有对地方政府好大喜功的反思,有对房地产商人贪得

无厌、尔虞我诈的辛辣揭示,有对政府、银行、房产商盘根错节助长房价的剖析,更有对民间百姓的悲悯,体现出作家的担当意识、责任感。

我对作家勇气的佩服还来自于文学创作的规律层面。在当今社会中,写实是有难度的,你写的东西要经受读者因太熟悉而变得刁钻挑剔的眼光,这往往更需要扎实的生活积累、细节的刻画能力、人物的塑造能力、情节的把握能力。《楼市》,是当下中国每天出现频率最高、和百姓关系最密切的话题,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甚至还深有研究;再者,楼市的新闻不断,拆迁、跳楼、涨价、虚假销售,早把人们的神经折磨得麻木,作者再直接写它,一要掂量掂量写出的东西还有没有人看,二要看写的东西能否超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闻,让读者重新得到审美的刺激。杨小凡有5年的房地产工作经历,对其中的林林总总烂熟于心,丰富的第一手观察加上作者多年的创作修炼,终于在《楼市》中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楼市,既是全景

的,又有栩栩如生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场景、扣人心弦的故事、波澜起伏的命运。

有人曾开玩笑说,《楼市》是时下的购房指南,这可能是因为作家写得真实、真诚,也因为作家写出了一种预见。看小说,实际上也是看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和智慧。这篇小说若真能对读者买房有帮助,也算是文学的无用之用了。但这还不够,《楼市》首先是文学作品,它更重要的是以文学的方式书写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美丑善恶,寄寓着作家希望借助作品,使世道人心和社会生活受到净化的理想情怀。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誉为19世纪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式的《人间喜剧》最为突出的成就或贡献,就是塑造了作家所处时代的典型人物,写出了特定时代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个性习惯,它是人的“百科全书”,而不是事的“百科全书”。《楼市》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众多属于这个时代的、经过作家点睛之笔的人物,是能

在漂泊中前行

——读张清龙《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丁华章

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就要中断,亟需接续。

张清龙的诗集《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让人心生人生无常、稍纵即逝的慨叹。正如这本诗集的名字那样——《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历史的兴衰更替存在着许多偶然性,人生也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而起伏跌宕。谁能料想,张清龙竟能辞去人皆羡慕的稳定工作,踏上了一条艰辛而又无法预测的漂泊之路?我不知道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抑或是命运使然。

在消费化、大众化、欲望化的文学语境中,

襄山山《寒露寒》

怜悯“情敌”泯恩仇

襄山山的短篇小说《寒露寒》(《江南》2013年第1期)写出了两对老同学几十年的情感纠结和现在的境遇,让人在唏嘘的同时感到欣慰。安璐敏没有想到,30年后竟接到大学同学、“情敌”乔秀云的电话,说“想请你们夫妇俩来我家坐坐”。当年,陶明亮主动追求安璐敏,毕业前,陶明亮却突然提出分手,原因是迷上了乔秀云,“安璐敏恨乔秀云超过了恨陶明亮”。直到她遇上现在的先生何帆,这恨才化解掉。大学毕业后,陶明亮带着乔秀云去了美国,陶明亮在大学当教师,乔秀云当编辑,儿子也很优秀。条件这么好怎么回国了?原来,陶明亮的儿子因失恋跳楼自杀。听到这里,安璐敏对乔秀云的恨化作了同情,终于上前抱住乔秀云,“眼泪汹涌而出”。

小说细致地刻画了安璐敏内心细微的变化和良心的涌动,同时也写出了陶明亮直面人生、坚强生活的勇敢和毅力,令人心生敬佩。

(杨国庆)

想,这应该是他走在路上的内心独白。可贵的是,他没有颓唐、堕落,而是直面人生,以坚强和执著冲破人生困境。张清龙用近乎直白的语言向我们捧出了一颗赤子之心。从这些长长短短的诗句中,我们能够拾捡到他在漂泊路上的点点滴滴,从而也真切地体验到一代青年的生活处境以及他们对美好未来的不懈追求。

诗以情动人,情以象现,象以意化境。好的诗能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入境、入情。《青春是一本

太仓促的书》从主题层面上说是一本青春诗集,但没有矫情,没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造作。这是作者感受世界、感受人生的内心对话,具有细腻和幽深的哲理。张清龙习惯用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情感,他的怀乡诗注意了细节的表现,比如用布鞋表现母爱,由一杯水引发乡思、由一场雨想起爹娘,很容易把读者带入情境之中。这种由情境构成